

陳麗華，《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年，11，379頁。

1980年代末，臺灣客家文化運動興起，客家意識逐漸高漲，伴隨着臺灣學科自身深化的背景，臺灣學者日益認識到客家族群的建構性，並對「客家」這一族稱進行反思，力圖用更精細的定義來審視歷史上的人群分類。《族群與國家——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1683-1973）》便是這種學術潮流的成果之一。在本書中，陳麗華以臺灣六堆地區的客家群體為研究對象，從人類學的角度，以民族志的方法考察經歷清朝、日本、中華民國三個不同國家政權的六堆地區，在地域認同和不同國家意識的共同影響下，客家族群認同的形成和演變。作者從具體的地域社會出發，關懷的是地方人士如何在將自身納入不同國家的同時塑造其獨特的身份認同，更為重新思考從帝制時期到當代的族群塑造提供參考。

在第一章「導論」中，作者回顧了近年來臺灣客家研究的脈絡以及關於國家與族群之關係的主要理論，並介紹了六堆地區的環境與開發。對歷史因素與當代臺灣客家族群之貫通主要有「原鄉」論和強調「臺灣社會特殊的歷史經驗」兩種回答，而作者在強調客家人在臺灣的經驗時，更注重考慮除語言、祖籍、地域社群等變量之外的國家影響。作者在書中將「國家」與「族群」的互動作為重點，認為「國家既是行政治理的機構，同時也是文化理念的集合體。族群意識並不是一種地方性的、和國家相對的分析概念，恰恰相反地，它的衍生和表達，深深地植根於不斷變化的國家意識當中」。（頁19）不同於目前學術界對六堆地區的研究主要聚焦於清代以前，陳氏將研究時段從清初延展到1970年代，從而貫通了清代以後國家轉變的長時段歷史。

第二章作者試圖通過六堆地區的「莊」與「嘗會」、「忠義亭」的祭拜結構和「粵人」的「學額」之爭來回答六堆地域社會如何在清代邊疆開發過程中形成以及清朝的人群分類方式對其身份認同的影響等一系列問題。康熙年間，來自粵東梅江上游的客語群體來到南臺灣的下淡水流域開墾，他們以「莊」的形式和閩南福佬話及平埔族群比鄰而居。在鎮壓朱一貴動亂的過程中，六堆地區的軍事性地域聯盟開始形成，其「義民」身份亦得到朝廷的承認。同時，以地域宗族性的祭祖活動為基礎的「嘗會」和同地域或跨地域的神靈典祀成為地域社會的重要組織方式，並以此構建了六堆人士共同的廣東來源記憶。六堆地區的義民廟與北部的新埔義民廟在祭拜結構上有很大不

同，這說明「忠義亭」作為六堆地區客家族群象徵的特殊地位，它一方面是祭拜歷代六堆義民的場所，另一方面則表達了與清廷的密切關係。作為客語群體的村落聯盟組織，六堆在清王朝的治理下仍然習慣於以廣東省籍來表達自我認同，這在六堆地區的昌黎祠和爭取「粵籍」學額上表現出來。省籍分類使六堆群體成為臺灣的「客民」，但也維持了他們「漢人」的身份，即使對客語群體最有敵意的閩南士紳，也未將其視為「非我族類」。對於臺灣地區而言，「客家」作為一個種族標籤，來自於西方人對廣府話中對外來人之稱呼的轉介。

第三至六章討論的是殖民統治下六堆地區地域與族群認同的演變。日治時期的殖民政策經歷了日治上半葉軟硬兼施，二三十年代延長主義、同化主義的推行，到「中日戰爭」之後以「皇民化運動」三個階段，這些一以貫之的殖民政策對臺灣包括六堆社會內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行政控制和社會經濟上，日治上半葉，殖民者一方面通過水利、重興地方禮儀等手段來獲得民心，另一方面，「潮州事變」使六堆地區的武力、稅收權力以及地方領袖的任命權均被收編或消解，六堆從此由實質運作的社會組織轉變為地方人士表達地域認同的符號。其後延長主義、同化主義的推行使臺灣與外部世界聯繫日益緊密，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新一代地方精英登上了六堆的政治舞臺，以出口為導向的香蕉種植業大盛，六堆地區的許多士紳亦投入到這一行業中，向島外擴展市場。近代教育的推行使六堆與附近地區的語言差異凸顯出來，六堆地方領袖亦利用嘗會財產與科學會資源興辦近代學校。二戰時期，糧食增產運動和經濟統制尤其是糧食體制的改變和餘糧政策的實行，對六堆地區造成了強烈的衝擊，而協助殖民政府執行徵兵、納糧等政策的本地領導人便成為人們指責的對象。

拜祭禮儀是六堆地方人士用以建立國家和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在日治初期，宗族構建出現了與廣東原籍建立聯繫和整合臺灣島內的同姓人群兩種趨勢，在日治後半葉六堆地區經濟發展的助力下，興建寺院、到中國「祖廟」進香、回鄉祭祖、重修祠堂、編修族譜等禮儀拜祭活動盛極一時。但「中日戰爭」的爆發使殖民者推行「皇民化運動」，除了強制「廢廟」，對於在戰爭中死去的臺籍日本兵，亦用日本的神道教儀式「神式莊葬」為他們舉行葬禮，試圖將殖民地人民完全變成「日本人」。清王朝統治時期六堆人士用以表達國家聯繫和族群認同的「忠義亭」也逐漸失去其地位。雖然日治初期「忠義亭」撤下清帝的牌位改奉天皇的舉動說明它仍是表達六堆族群與國家之聯繫的重要場所，但在同化主義推行之後，「忠義亭」成為祭祀明治

天皇的場所，其作為六堆客語群體拜祭中心的角色便逐漸淡化。同時，由於日治時期出生和成長的新一代年輕人對「六堆」的認知更多地建立在殖民政策下的地方行政、教育和文化之上，運動會（主要是六堆聯誼網球大會）代替「忠義亭」的祭拜禮儀成為六堆表達地方意識與帝國認同的主要手段。戰爭時期，極富國家認同意識的「聖火傳遞」儀式更滲入包括六堆在內的臺灣地方社會。

在殖民政變遷的大背景下，從「Hakka」到六堆「客家」族群自覺認同的過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日治初期的土地改革瓦解了「閩主粵佃」的格局，改變了清帝國原有的「土」、「客」的不平等地位，使得「客籍」由原來法律和社會地位上的意義轉入文化和族群的領域。當殖民者以語言劃分種族群體，並以籍貫名稱作為語種名稱時，「廣東種族」成為客家群體的標籤，而同為來自廣東省潮州府的移民則成為「福建種族」，其後兩個「種族」被賦予迥異的文化風俗，使兩者的界線更加分明。此外，關於客家研究書籍的出現和中國廣東地區客家群體對「漢人」身份的爭論也推動了最初的客家意識在矛盾齟齬的語境中萌芽。20年代末期，在民族主義潮流的裹挾下，臺灣的地方人士加強與中國華中、華南的聯繫，島內的城市生活和社會流動亦使基於語言和地域的客家人組織逐漸發展起來，不同地域的客語群體自覺逐漸加強。二戰中，臺灣社會的年輕精英大量進入中國，他們或在上海、南京等地依靠親日政權及其商貿網絡獲利，或在廣東一帶投靠國民政府抗日，在這一過程中，臺灣客家人的群體意識不斷增強。日軍在中國東南及東南亞侵略步伐的加速，使該地區的族群受到更多關注，其中中國與西方學者對「客家」與「漢族」之聯繫的相關論述也在臺灣傳播。相對於島內人士來說，在島外被捲入中國複雜的政治洪流的臺灣人士往往通過強調其「客家」身份來掩蓋其殖民地子民的身份，這也使他們對「客家人」身份的建構有更強烈的感受。

第七章考察的主要是戰後面對國家政權的再次轉變，六堆地區如何融入新的國家以及其族群意識如何與新的民族國家中的客家認同相結合。隨着日本的離開和外省人的大量湧入，六堆的地方權力格局在大洗牌的同時又有其延續性，在地方選舉中勝出的多是戰後新的政治寵兒「半山」群體，以及在日治時期便建立了政治基礎的地方人士。經濟上，戰時積累了大量資本的中產階級紛紛尋求投資之道，但同時幣制改革和土地改革也對中產階級和嘗會組織產生巨大的衝擊。為了呼應戰後的民族意識，將自身納入新的國家政權，六堆人士利用日治時期便為人所熟悉的運動會和聖火，重興「忠義亭」

和「天后宮」等殖民時期遭到嚴重衝擊的廟宇和禮儀，來表達抗日記憶和新的國家認同。其後「忠義亭」改為「忠義祠」，則不僅改變了「忠義亭」原來的性質，更是「去殖民化」和「中國化」的表現。在這一過程中，六堆的「客語認同」與中華民國的「客家」概念亦逐漸結合。從重修後的「忠義祠」牌位中可以看出其中地域、祖籍、語群認同與對漢人政權和血統之認同的多重疊加，而掌握了文字書寫權力且具有客家自覺意識的「半山」及外省精英，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試圖將日治時期的「廣東種族」和民國政府時期的「客家」這兩個不盡相同的族群整合為一個整體，其中羅香林主導的地方和家族歷史的彙編，便將六堆地區納入了客家移民和僑居的歷史體系之中。

在「結語」部份，作者對臺灣地方社會如何在與幾個不同國家的互動中建構起客家族群認同這一長時段的過程進行了反思。清帝國統治時期以籍貫劃分「閩人」和「粵人」，地方社會不同的語言和風俗習慣並未成為行政管理上考慮的要素，時人的觀念中並沒有族群意義上的「客家」，他們用與福佬話相對的「客民」或明清以來的省籍「粵」來表達其身份及漢人認同。作者認為，雖然六堆內部很明顯都是講客家話的人，但是地域認同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省籍觀念才是其身份表達的最重要詞彙，因此此時六堆地域聯盟並不能用族群性來概括。六堆地區的客家族群意識，要追溯到晚清至日治時期，這一時期不僅將語言和文化因素納入國家的人群分類中，亦轉化了六堆表達集體意識的方式。戰後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一方面臺灣客語族群被納入中華民族系統內的「客家民族」；另一方面，又將中國近代以來的族群理論挪用於臺灣社會，以完成國家認同。而1980年代末客家族群運動乃至更晚的一系列社會政治變化，更成為臺灣客家族群自覺意識廣泛傳播的關鍵，客家認同從「樸素文化認同」轉變為「制度化政治認同」。

縱觀全書，其線索有二：一方面作者在整體上以時間變化為線索，先後分析了臺灣六堆地區在三個不同國家政權下的身份轉換和族群意識的衍生；另一方面，由於作者認為每一個政權「背後不同的行政體系、經濟脈絡及文化理論的建構」，都是不同時期客家群體意識演變的背景，因此在每一個政權的框架之下，作者都導入該階段統治臺灣之政權的政治運作和經濟政策對六堆地區造成的衝擊，進而分析其文化和禮儀政策對六堆地區群體意識和國家認同的影響，最後討論六堆族群意識在這一階段的狀態。可以看出，兩條線索均有很強的邏輯性，使得論述更加清晰和嚴密。

本書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特點：一是本書具有明顯的人類學傾向，字裡行間可見西方人類學的影響與痕跡，作者主張種族作為「想像共同體」的觀

點，並重點以之分析日治時期的臺灣社會。在這一基礎上，作者採用民族志的形式，雖然探討的是族群與國家之關係這一大視野下的論題，但她從六堆地區的具體人物入手，為讀者展現了在國家政權的變遷中，六堆地方人士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這也使得讀者更易生出同情之心。這一特點也可以在作者所運用的史料中表現出來，除縣志和日治時期的檔案、公文等官方史料以外，作者也大量引用報刊、帳簿、嘗簿和族譜等民間史料。二是作者雖然以六堆地區為研究主體，但眼光又不囿於六堆地區，作者常將六堆地區與臺灣北部桃竹苗以及中國東南地區的客家社會進行比較，既突出了六堆地區在客家族群認同構建中的獨特性，又說明了六堆客家納入臺灣乃至中國整體客家認同的過程。

以上兩個特點固然是本書在客家研究領域的突破，但筆者對此亦有兩點建議：一是作者引用了大量與六堆地方社會精英有關的材料，可以看出六堆地方精英在構建六堆地方與國家認同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但群體中精英階層的認同並不能作為整個族群自覺認同之代表，且這些精英多是與外界接觸較多的商人或政客，外來的刺激更易催生出族群認同。筆者認為，在田野調查中更多地了解不同階層與身份的六堆人士對自身「客家」身份的認同程度，對於本書主題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二是六堆地區的族群認同，無論是清朝的「粵人」，還是之後的「客家」，都與其內部在遷臺之前就形成的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心理和習俗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若能對其遷臺前的歷史和催生其族群認同的文化基礎進行闡述，會使六堆客家認同的形成顯得更加清晰、更具有連續性。

張琪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曼素恩著，羅曉翔譯，《張門才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282頁。

18世紀末至19世紀，中國常州延續傳承着這樣一門士紳家庭才媛生活：本家族內的男子多游離於官宦、教書與行醫之間，也為生計從事於商業。但就是這戶普通的士紳家庭，先後培養出三代才女。《張門才女》不僅全面記錄了其這個時期的時局的觀點和看法，更對其家族男女們的文學造詣進行了